理论·思政课

投稿邮箱：hnrbllszkb@163.com

警惕和防范“恩格斯停顿”，让技术红利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魏琪嘉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恩格斯通过实地调研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生动记录了一个耐人深思的历史矛盾：机器大生产推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社会总财富持续扩张，然而广大产业工人却长期面临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劳动条件恶劣、相对贫困加剧的困境。经济史学者将这种“生产效率持续抬升、普通劳动者收益提升长期滞后”的现象概括为“恩格斯停顿”。这一概念刻画的不只是一段特定的经济史实，更揭示出一条具有长久启示意义的命题：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天然自带普惠属性，生产力的跃升不会自动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分配失衡风险，正以新的形态显现出来。如何准确辨识并防范化解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现象，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人民至上、走好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一、准确把握新技术发展背景下“恩格斯停顿”的新特征

工业革命时期的“恩格斯停顿”，主要体现为机器替代体力劳动，矛盾集中于工厂内部资本家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体系的改造，突破了体力劳动替代的边界，扩展至认知劳动、创意劳动、管理辅助等领域，使得潜在的“停顿”现象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新特征，风险传导的速度、覆盖范围与作用机理都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劳动替代由体力层面向脑力层面延伸，劳动力内部分化加剧。传统工业机器主要承接重复性、高强度的体力作业，白领、知识性岗位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新一代数字技术则能够胜任文本整理、数据分析、日常办公等流程化脑力工作，劳动力市场由此形成新的分层格局。精通前沿技术研发的高端技术人员成为稀缺人才，能够获得显著的技能溢价；而从事标准化流程性工作的普通白领和基层专业人员，则成为技术替代的重点对象。技术变革带来收益鸿沟，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加复杂、收入差距有被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第二，红利集聚效应加速放大，收益向数据、算力、平台资本集中。新技术产业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壁垒效应，数据、算法、算力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而这些要素大多掌握在头部平台资本手中。相较于工业化阶段技术红利缓慢向外扩散，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收益正在持续向头部企业集聚。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增量收益更容易沉淀为资本回报，难以同步转化为普遍的劳动报酬上涨，红利向普通劳动者外溢的通道变窄。

第三，冲击方式由显性裁员转向隐性挤压，“工资停滞”现象更为隐蔽。传统工业化转型的就业冲击往往直观可见，多伴随工厂关停、岗位批量消失等现象。而新技术发展带来的调整更多是渐进式、结构性的。许多企业在引入新技术之后，并不直接大规模裁员，而是放缓新增招聘、提高单人任务负荷、压低岗位起薪，劳动者议价能力有所弱化，工资增长陷入停滞，形成不易察觉的“隐性降薪”。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迭代持续加速，劳动者原有技能快速“折旧”，技能更新难以跟上技术演进节奏，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被明显拉长。

第四，用工关系更加灵活，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有效适配。在技术革命时代，平台用工、项目外包、远程接单等新型就业模式大量涌现，灵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数字技术在拓展就业容纳空间、丰富劳动参与方式的同时，也重构了传统雇佣契约。不少劳动者跳出标准化劳动关系框架，原有依托正式用工形成的薪酬集体协商机制、劳动安全保护安排以及社会保障渠道随之弱化，由此导致劳动收入的稳定性下降，风险自担属性增强。

第五，风险跨区域跨行业传导，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新技术落地节奏与区域产业技术基础紧密相关。率先推进产业技术升级的行业，生产率提升往往更快，如果配套调节机制滞后，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同步扩大。传统产业集中、技术转型滞后的区域，不仅难以分享技术红利，还会面临外部竞争挤压，相对收益持续走低。这意味着，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分配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单一地区、单一行业，有可能演变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挑战。

二、正确认识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现象

看待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不能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技术创新本身是中性概念，新技术是解放生产力的工具，技术向善的核心要义，就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生产生活。把握这一导向的关键，在于不断增强技术红利的普惠性。警惕和防范“恩格斯停顿”，不是简单做效率和公平的加减法，而是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客观研判技术变革的多重效应，树立全面、审慎、主动的治理思维。

首先，“恩格斯停顿”不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宿命，而是特定制度条件下的阶段性现象。技术变革会天然重构生产要素回报格局，但并不注定走向分配失衡。工业革命时期之所以出现长期的工资停滞，根源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当时缺少适配的劳动保护、收入调节与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在分配博弈中长期占据绝对优势。放到今天，新技术本身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丰富产品供给、催生新赛道新岗位，具备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巨大潜力。所谓“停顿”，本质上是生产力快速向前突破，而要素分配规则、劳动力培育体系、市场监管框架、再分配调节机制未能同步调适，制度供给滞后于生产力变革所产生的矛盾。只要主动完善生产关系，就能够校正分配偏差，避免失衡固化。

其次，要客观区分技术革命对就业与收入分配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会淘汰一部分旧岗位，同时创造新的产业赛道、新的劳动需求，就业总量存在动态平衡的可能；但短期内，摩擦性失业不可避免，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的收益分化会快速显现。我们既不能夸大技术带来的冲击，走向排斥创新、阻滞技术变革，也不能放任市场自发调节，认为差距扩大是转型必然代价、静待市场自行出清。如果任由分配失衡持续累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行，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制约国内大循环，也会削弱广大劳动者参与创新、拥抱变革的积极性，最终反过来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防范“恩格斯停顿”必须锚定普惠共享这一价值目标。技术为人类所用，是技术向善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们提出的考题，不是要不要推进技术变革，而是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来引导技术发展。如果制度设计只偏向效率提升、资本增值，忽视劳动者权益，技术进步就容易走向少数主体独享红利；如果在技术研发、产业落地、收益分配的全链条嵌入普惠导向，推动资本、数据、劳动等要素合理分配增量收益，新技术就能够成为缩小差距、增进共同福祉的有力支撑。这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必须把公平的考量前置，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主动识别、提前干预，及时消除分配失衡风险和隐患。

总的看，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是生产力快速跃迁带来的治理命题。我们推进技术变革、加快数字化转型，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统筹兼顾，既释放技术创新活力，又守住共享发展底线，才能走出一条效率提升、就业扩容、收入合理增长协同并进的发展路径。

三、有效防范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现象

防范和缓释技术发展带来的分配失衡风险，关键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打通技术红利向广大劳动者传导的渠道，在鼓励技术创新、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前提下，引导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一，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多元要素收益共享机制。初次分配是理顺要素分配关系的首要环节。要持续探索数据要素收益分配规则，厘清数据开发利用中的劳动贡献，推动平台企业和科技企业建立利润分享、员工持股、项目分红等收益共享机制，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超额收益。健全算法公平审查机制，规范平台派单、定价、考核规则，遏制依靠算法压榨劳动收益的行为，有效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报酬。适应数字用工特征，推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稳步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推动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第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化解技能错配矛盾。面向长远，要着力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布局，优化学科设置，更加注重创造性思维、跨场景协作、人机协同等能力培养，减少标准化、流程性的技能供给。面向存量劳动者，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针对重点群体开展普惠式转岗培训、数字素养培训，降低劳动者技能更新成本。加大对低技能群体、中老年劳动者、欠发达地区劳动者的培训帮扶，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能力差距，推动劳动者从被动替代转向主动适配。

第三，优化再分配调节，筑牢兜底保障的民生防线。用好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增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持续完善对平台企业和科技企业的税收征管，引导超额收益适度回流公共服务领域。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通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转移接续通道，补齐新业态劳动者在养老、医疗、工伤保障上的短板。健全最低工资动态调整、失业救助、就业帮扶体系，对受技术冲击出现失业、收入下滑的群体实施精准兜底。加大对传统产业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缩小区域之间差距。

第四，强化市场治理，以公平竞争抑制红利过度集中。持续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规范头部平台企业的数据壁垒、排他性经营行为，防止市场力量过度集中，避免少数经营主体长期独占技术变革红利。建立新技术落地应用的治理规范，引导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优先选择岗位转型、技能培训方案，而不是简单以裁员、压薪实现降本增效。把劳动权益、分配公平纳入科技伦理审查，从源头减少技术应用的负外部性。

第五，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培育科技向善的社会生态。引导科技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鼓励设立劳动者转型帮扶基金、公共技能培训基金，通过公益方式帮扶转型困难群体。推动将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嵌入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产业落地全流程，在行业内形成兼顾效率与劳动福祉的共识。搭建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劳动者多方共治平台，凝聚发展共识，形成鼓励创新、兼顾公平的治理合力。

技术变革的浪潮不可逆转，普惠共享的取向不可偏移。把制度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分配关系的动态调适上，让每一次生产力跃升都能转化为劳动者可感可及的收益改善，我们就能在拥抱技术变革中不断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以湖湘文化涵养新时代工程人才的人文精神

匡睿颖

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是湖南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丰富资源和深厚基础。湖湘文化历经千年积淀与时代焕新，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力量。如何让湖湘文化真正融入工科学生的培养过程？工科学校的思政课堂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的情怀、以革命文化坚定信念、以现代文化激发创新？这是新时代工科人文通识教育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

心忧天下、胸怀家国，以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湖湘文化的鲜明特质，在于崇文重教的悠久传统，也在于始终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从屈原的“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到贾谊的“以贫苦民为罪”，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是湖湘文化鲜明的精神底色。在工科人文通识教育中，湖湘文化的教学不能局限于人物事迹和历史知识的讲授，还应重视学生对文化精神的理解。岳麓书院、岳阳楼以及湖湘先贤故居等文化场所，为开展现场教学提供了丰富资源。高校可结合历史影像、经典研读、实地研学等，将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让学生理解先贤心系家国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教学还需关注工科学生的专业特点。例如，在工程伦理、技术应用等相关讨论中，引导学生思考工程建设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认识技术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这样的教学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度，也能使学生从自身的专业学习出发，理解家国情怀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坚定理想、砥砺意志，以革命文化筑牢工科学生的信仰根基。湖南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革命先辈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比如，新民学会成立之初，青年志士便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湖湘革命文化鲜明的精神标识。湖湘革命文化融入工科人文通识教育，既要重现革命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要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与奋斗精神。高校可通过历史影像赏析、革命史料研读、红色场馆研学等活动，将革命先辈的人生经历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帮助学生体会他们在艰难处境中坚守信仰、坚持斗争的精神力量。考虑到工科学生的学习特点，还可将革命先辈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与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联系起来。例如，针对实验反复失败、技术难题久攻不克等情况，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挫折，学会在困难面前保持定力，在反复探索中磨炼意志。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学生在理解革命历史的同时，逐步形成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面对挑战敢于迎难而上的精神品格。

守正创新、锐意进取，以现代文化培育工科学生的创新精神。湖南人在“三个高地”建设、农业现代化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中，展现出来的守正创新、锐意进取等现代文化特质，是工科院校思政教育的宝贵资源。高校可组织学生深入工程项目、企业一线、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案例分析和实践活动，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技术如何回应人们与时俱进的实际需求、新产品如何提升人们的生活福祉。结合工科学生的专业特点，还可围绕文化遗产数字化、智能产品设计等主题设置实践任务，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探索新的技术方案。例如，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中，引导学生尝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同时注意文化内容的真实性与表达的准确性。教学评价也应适当增加对问题发现、方案论证和实践改进过程的考察，使学生在具体项目中理解守正与创新的关系，逐步强化敢于探索、善于创造、善作善成的创新意识。

（作者系长沙工业学院教师。本文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科人文通识教育基地”研究成果）

从“离身悬浮”到“具身在场”：思政教育场景的智能转型

刘淑芳 于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这些重要论述为数字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

当前，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教育生态。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介入，使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模式、师生关系和认知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教学模式来看，思政课正从传统的课堂教学，向“云端+地面”的混合空间延伸。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课堂不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性场所，思政课正面临“去中心化”的挑战。从师生关系来看，大学生更习惯于多模态、交互式的信息接收，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被数字平权解构，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也难以实现思政教育形成深层情感认同的目标。从认知方式看，虚拟交往的日常化使学生日益出现“身体缺席”的认知倾向：信息获取越来越多，但切身体验越来越少；概念掌握越来越快，但情感认同越来越浅。这一“离身化”困境，凸显了具身认知理论对于思政教育的独特意义。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不是脱离身体的抽象概念，而是身体与环境交互的产物；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知和运动体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怎样认识和看待世界。数字时代的师生关系重构，要求思政课教师从“讲台之上”走到“学生之中”，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互动”，在具身参与中实现价值引领，在思政课建设中不断展现新气象、探索新作为。

推动高校思政教育从“离身悬浮”向“具身在场”转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一是重构具身认知空间，打造“在场化”教学场域。湖湘文化强调身体力行、经世致用。这种文化基因与具身认知理论高度契合，为高校思政课具身转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理论资源，也为具身认知教学提供了场域。如，湖南大学以岳麓书院作为教学场域，引导学生深入书院体验湖湘文化，让学生完成对实事求是、传道济民等书院思想传统的认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打破传统课堂的场所边界，走进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构建“课堂—校园—社会—虚拟”四维联动的教学空间。还有，“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中，学生驻足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重温《改造我们的学习》，在行走中感悟信仰力量。截至2025年11月，湖南共有红色文化资源4592处。这些红色资源的空间结构、展品序列和历史叙事，都是构建“在场化”“沉浸式”教学场景的富矿。

二是深化技术赋能，构建“交互式”教学模式。建立数字资源库，开发基于具身认知的智能教学系统。利用数字技术，实时捕捉学生的身体反应与情感状态，综合学生诉求，进行学情分析，为教师精准教学提供依据。如，长沙医学院利用情感计算技术对学生学习情绪的实时反馈，实现个性化教学策略优化。湖南工商大学建设思政课虚拟教研室，推动优质数字资源跨校共享，其开发的课程云平台覆盖全国261所高校。湘潭大学利用VR/A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打造“四史”虚拟仿真实验室，学生以VR设备“交互式”探访红色圣地，具身认知教学助力思政教育“入脑入心”。

三是加强要素保障，在“知行合一”中检验育人成效。思政教育场景的智能转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调推进。政府、学校应加大数字化场馆、沉浸式体验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同时，改革评价体系，构建“认知—体验—践行”递进式教学链，打破“一张试卷定成绩”的传统评价，建立过程性、表现性、发展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实践参与、情感表达、行为变化、具体收获纳入考核范围，在知行合一中检验育人成效。

【作者系邵阳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邵阳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副主任。本文为2024年度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大思政课’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24A181）阶段性成果】

将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思政课”建设

陈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伟大抗战精神有效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扎实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既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大思政课”内涵与实效的重要途径。

明确目标导向，培育时代新人。将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思政课”，首要前提是廓清育人目标。必须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将其转化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核心精神力量。一是树牢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和为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不懈斗争的崇高理想，使其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将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思政课”，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有效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认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引导学生在复杂环境中筑牢信仰之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二是厚植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彰显了国家存亡之际个人的民族大义。融入“大思政课”，就要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引导学生将个人前途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内心深处种下报效祖国的种子，将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内在动力。三是激发奋斗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中华民族铮铮铁骨的生动写照。面对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大思政课”要用先烈事迹感召青年，教育引导他们在面对困难挫折时敢于亮剑，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时挺膺担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建功立业。

畅通融入渠道，让青年学生深度感知与践行。当前，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思政课”仍面临红色资源整合不足、教学模式传统、评价机制滞后等现实短板。破解这些难题，可依托数智化技术打通育人堵点。一是数智赋能，建立集挖掘、研发、使用为一体的内容供给机制。在教材编撰上，进一步精选抗战历史中的重要文献、可靠史料、典型案例、英雄事迹，使之融入文字教材、多媒体教材、复合型教材，全面深入且生动地反映伟大抗战精神。二是推进实践化教学，重构沉浸式教育场景。通过打造沉浸式教学单元，让学生在虚拟重现的场景中与历史对话。同时，坚持理论与现实相贯通，组织学生走进抗战遗址开展实地研学与社会调查，在“行走的思政课”中实现抗战精神从感性认知向理性认同、自觉践行的跃升。三是构建智能化评价体系，实现全过程动态监测。全程追踪学生的线上学习轨迹、课堂互动及实践成效，精准描绘学生成长画像。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的评价，不仅能科学评估情感态度和价值认同的变化，更能为优化教学策略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实现“经验育人”向“精准育人”的转变。

构建长效机制，凝聚“大思政课”建设合力。将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思政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协同，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机制。一是强化内外协同，构建同频共振的育人格局。在学校内部，建立教务、学工、团委、马院等多部门联动的协同育人机制，将抗战精神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校园文化和日常思政工作中。在学校外部，深化学校与社会各界的协同。主动联合抗战纪念馆、档案馆以及高新科技企业，建立常态化的大师资库与大资源库，形成校内外联动合力，将社会大课堂与校园小课堂紧密结合。二是激发主体能动性，实现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开展一体化集体备课与跨学段交流，全面提升教师数智化素养与情景教学设计能力，使其成为生动传播者。另一方面，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鼓励学生通过参与口述史访谈、制作微视频、开发数智化思政作品等方式，改变被动接受角色，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主动讲述者、传承者。

【作者单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项目“数智化推进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25C52）阶段性成果】

思政课